

【窥海斋】

命运这东西，果然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我，在小得不能再小——小得连名字都没有也不配有的小山村长大的我，如今最常去的地方却是中国大得不能再大的大上海，年年去，而且是在最好的深秋时节去，不是去某所极档次大学的演讲，就是出席其乐融融的《外国文艺》编委会，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今年亦然。

深秋时节的上海的确宜居、宜游、宜去，不燥不湿，不冷不热，矮株牵牛花仍在忘我地编织五彩图案，硕大的悬铃木叶片则开始沉思何时飘零——痴迷与冷静，执著与洒脱，醉与醒，仿佛在向世人暗示什么，尤其在向我暗示什么，但我当然不理解也不理会。

那天预定下午2:00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演讲，而

“阿Q”在上海

□林少华

我从太湖经苏州赶回上海市中心一家酒店时，已经12:40。约定12:50来接的交大的车提前等在门前，而我还没有吃午饭。须知，演讲这东西也是个体力活儿。按以往经验，加上“互动”、签名等等，没有两个小时以至三个小时是下不来的。早上时间紧没吃好，肚子已经瘪了半边。届时若饿得老眼昏花，思维短路，在大庭广众之下来个语无伦次，半世英名休矣！

放下行李，赶紧跑去隔壁一家便利店抓了一块奶油面包和一罐咖啡。不巧正是午餐时间，收款机前排队排了十几个人，移动速度很慢。于是我向队前一位外企职员模样的年轻男士说自己有急事能不能加个塞儿，对方平静地回答他也急。于是我转而求他身后一位衣着长相无论怎么看都颇有品位的女孩，不料女孩似乎没看见也没听见，兀自冷冷地目视前方，仿佛正在眺望远方海面一艘即将沉没的油轮。我能说什么呢？只好灰溜溜地返回队尾。手中托盘一抖，面包滑落在地。我赶紧拾起，又另抓一块，并排放托盘中……

连连拒绝，绝无可能为之欢欣鼓舞。气恼、费解。一个人加塞儿，顶多耽误一分钟时间，一分钟都等不得吗？再说，非我自吹，无论怎么看我都应该不像是存心占这点儿小便宜的形象猥琐之人。为这场演讲特意从衣柜深处拎出穿在身上的略带奥球儿味的藏青色西装，如门外晴空一般蔚蓝的纯棉免熨衬衫。一会儿扎上领带，去瑞典国王面前领诺贝尔文学奖都无需重新包装。然而我被拒绝了，活活被两个自己带的研究生那般年龄的年轻男士和女孩拒绝了。小小的加塞儿要求未被受理。没有妥协，没有折衷，没有中间地带，OFF，“咔嚓”。

所幸，正在研究“阿Q在日本”的我很快想通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侥幸进城的乡巴佬吗？以为自己翻译了几本小书、写了几篇“报屁股”文章就该人人都向你脱帽致敬吗？何况，说不定人家的急事比你的更急——银行自动取款电脑系统或许正等抢修，外企劳资谈判大概箭在弦上，南极科学考察船有可能即将起航……

天佑神助，80分钟后我准时出现在演讲会场。一进门就响起掌声，无人拒绝，一张张真诚的笑脸，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也许多少仍受80分钟之前的自省意识和谦卑心情的影响，作为开场白，我这样说道：“诸位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来自青岛，来自青岛那座尽管自命不凡却连省会城市也不是的地方小城。可是，即使在那座地方小城，这么一大把年纪的我也没混得个一官半职，至今仍在教研室副主任兼党支部副书记手下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当一名平头教员。风雨如晦，我每每痛感自己此前人生途中失去的东西是多么惨重。就在这样的时刻，忽一下子飞到大上海，并且在上海交通大学这所足以同复旦分庭抗礼的真正响当当的‘985’高等学府这么堂而皇之的地方讲点什么、忽悠点什么，作为我，当然感到分外激动、分外幸福。因此，我要感谢给我这样一个宝贵机会的……”听众席上数次响起笑声，响起掌声，响起笑声加掌声。借用那位外国作家的话，正可谓“冰山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而这在便利店连连遭拒的场景之间，仅仅隔了80分钟——80分钟便将这同一个我置身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翌日飞回青岛。行前应上海作家孔明珠女士之邀，同法国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先生和钢琴家宋思衡君相见。席间我提起被拒绝一事，主人说那两人肯定不是上海人。我说那可可是发生在上海哟！“交大的掌声不也发生在上海吗？”

两个上海，两个我，或许，这也才成其为上海，成其为我。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社会话题】

中国需要和谐合作，不是非此即彼

□叶小文

有学者撰文《中国需要的是世俗道德，不是宗教》(载1月3日《环球时报》)说，鉴于西方的文艺复兴“摆脱宗教的束缚，包括宗教道德及律令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那为何现在又要将西方的宗教枷锁以先进文明的名义送给中国人，要中国人乖乖套上”，主张“重拾对传统的自信，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式发展适合现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

这些论断和主张，自有其理。但如何具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如何避免拾人牙慧，上入圈套，还要推敲。总不至因此就要把宗教作为世俗道德的对立面或“西方的宗教枷锁”加以贬斥，甚至作为欲去之“粗”之“伪”、欲防之祸水，来一个痛快的非此即彼、扬此抑彼。

中国需要的是和谐合作，不是非此即彼。

的确，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很重要。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强调传统的理性本质，而民族精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这种重铸，应该突出主导、主流，也要强调和谐、合作。应该“和而不同”，避免“同则不继”。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但孰去孰留不能简单化，现实往往是“江南三月，杂花生树”，只能不断在“多元一体”的包容中熔炼、融合，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中交流、交锋。并非谁最美，谁就居于“至

善至美”之不二法门；谁最“精”，其他就皆在“去粗”之列；谁要存，就必争夺主位排斥异端；谁有影响，就不断膨胀甚至走向极端。我们既要有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也要有对外国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包容和借鉴，博采众长，食而能化，化而能食，搞不得非此即彼、扬此抑彼。

的确，文艺复兴很伟大。文艺复兴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剑指“以神为本”和“以君为本”，倡导“以人为本”，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欧洲摆脱了腐朽的封建宗教束缚，也就是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西方近代人本主义，过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权利与本能欲望，虽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快速膨胀的个人，进而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全面紧张乃至一系列人类危机。面对文艺复兴后崛起的“膨胀的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架发疯的钢琴”，“神”管不住，世俗道德管不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管不住。今天，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这就需要有一个更广阔、持续的在“多元一体”的包容中熔炼、融合，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中交流、交锋的过程，搞不得非此即彼、扬此抑彼。

的确，我们应该“重拾对传统的自信”。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

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外来宗教也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才能在中国立足，与“天朝上国”一起分享“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老荣光。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这个正走向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就更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更善于在“多元一体”的包容中熔炼、融合，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中交流、交锋，搞不得非此即彼、扬此抑彼。

中国也不可能靠宗教解决问题，但说起宗教，不能不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宗教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群众性。我们要看到，宗教存在的自然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远远没有消除，宗教问题将长期存在。宗教问题常常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甚至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突破口，是极其复杂的。我国有上亿信教群众，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是我们党重要的群众基础。在这“三性”中，群众性是核心。既然是群众，就不能把信仰上的差异等同于政治上的对立，更不能把他们当成异己力量，就要坚持尊重人、团结人、引导人、服务人，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要推动各宗教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阐释，用积极健康的内容正确引导信教群众，使他们自觉坚定政治立场、增强法律意识、规范社会行为。

为此，建议少讲“中国需要的是世俗道德，不是宗教”这种听起来过瘾，其实是而非的话。

当今中国的主流、主导，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并非因此就要在“要世俗道德还是要宗教”中去作选择。

中国需要和谐合作，不是非此即彼。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